

论祖逖与北伐

杨 德 炳

(一)

祖逖字士稚，西晋泰始二年(266)，生于范阳道县(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①”。《晋书》卷六二本传称逖少孤，性豁荡，不修仪检^②，年十四五犹未知书。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赈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③。后侨居阳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年二十四(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后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午，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惠帝永宁元年(301)，辟齐王冏大司马掾，长沙王父骠骑祭酒，转主簿^④。累迁太子舍人，豫章王从事中郎。永兴元年(304)随惠帝北伐成都王颖，王师败于荡阴(今河南汤阴县西)，逖遂退还洛阳。同年冬，河间王颙大将张方劫持惠帝西至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虓、高密王略、昌平公模等竞相召征，逖皆不就。东海王越又以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之官^⑤。

以上是祖逖前半生的主要事迹。尽管史称他“梗概有大志”，有“英气”，似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还留下了“闻鸡起舞”的千古佳话。但上述事实表明，出身于“北州旧姓”的祖逖，与当时一般的士族子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从他与刘琨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他向往和追求的只不过是做一个“乱世豪杰”而已。事实上他跨入仕途不久也就转入了“八王之乱”的漩涡之中。故本传“史臣”论及他前半生时称：“祖生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这“贪乱”二字虽可能有点过分，但也并非毫无根据。

但当祖逖进入后半生时，西晋的政局发生了空前的巨变。首先是持续多年的统治阶级大混战——“八王之乱”给中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使西晋统治者的力量遭到致命削弱，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故几乎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李特、张昌、王如、杜弢等人领导的流民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了整个南中国；在北方则相继爆发了匈奴贵族刘渊和匈奴别部羯族首领石勒领导的反晋斗争。在这两股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西晋政权很快就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但刘渊、石勒的反晋斗争很快就由正义的反民族压迫的战争转化为非正义的民族侵扰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永嘉五年(311)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

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一举全歼西晋主力部队十多万。六月，洛阳陷落，怀帝被俘，西晋作为一个统一政权业已名存实亡（此时祖逖正好四十五岁）。在这大动荡的历史转折关头，西晋统治阶级的核心——门阀士族集团急剧分化。一部分腐朽沉沦不能自拔者终被大动荡的洪流所吞没，成为这个王朝的殉葬品；一部分流寓江左，创建了东晋政权，但却满足于偏安一隅；但也有一部分人振奋起来，走上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战斗前线，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业。刘琨在北方孤守并州，坚持斗争，祖逖自南方渡江北伐、收复中原，都是其中最突出的壮举。故《晋书》卷六二《刘琨、祖逖传》末“史臣”又云：“及金行中毁，乾维失统，三后流亡，递萦居髡之祸，六戎横噬，交肆长蛇之毒。于是素丝改色，踟蹰易情，各运奇才，并腾英气。遇时屯而感激，因世乱以驱驰，陈力危邦，犯疾风而表正，励其贞操，契寒松而立节，咸能自致三铉，成名一时。古人有言曰：‘世乱识忠良’。盖斯之谓矣。”

当洛阳失守之际，祖逖也和许多士大夫一样，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向淮、泗间流徙。从小就轻财好侠，贯于散谷周贫的祖逖，此时更是“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⑥。行至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古泗水入口处），坐镇建邺（今南京）的镇东大将琅邪王司马睿逆用逖为徐州刺史。建兴元年（313）五月，又征逖为其左丞相府谘议祭酒，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⑦。本传称：“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奋之志。……时帝（按司马睿此时尚未称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⑧。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於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祖逖这番话除对“晋世之乱”原因的分析明显不对（如说什么“非上无道而怨叛也”）外，对当时中原形势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他在北伐中采取的作战步署，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而司马睿虽“素无北伐之志”，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如果毫无一点北伐的表示，也不好向天下人交待。为了敷衍天下人耳目，乃任命祖逖为前锋都督⑨、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出师北伐；但又不给任何武器装备和一兵一卒，仅给千人给养和三千匹布。这无疑是给祖逖出了一道难题。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北伐的雄心壮志，同年八月，祖逖毅然“将本流徙部曲百馀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从而拉开了威武雄壮、艰苦卓绝的北伐序幕。

（二）

祖逖北伐的具体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屯兵淮阴，制造兵器，招募和训练士兵。本传称他“屯于江阴（按当作淮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但祖逖在淮阴究竟屯了多久？纪、传均无明载。《通鉴》卷九十将祖逖自淮阴出屯芦洲（今安徽亳县东）置于建武元年（317）六月条下，然观其后文即知此时祖逖不但攻灭了张平，迫降了樊雅，占据了谯城（今安徽亳县），而且打退了石虎对谯城的围困；而其中仅攻灭张平就花了一年多时间。以此倒推，则出屯芦洲当在建兴四年（316）。如果这种推测可以成立，那么祖逖屯兵淮阴的时间至少长达三年（313—316）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制造兵器，招募士兵和训练士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说百人渡江表现了他气吞山河的雄心壮志，那么屯兵淮阴为北伐作好充分准备而后行则体现了他在用兵上扎实而不轻浮、稳重而不冒进的名将风度。

第二步，占据谯城，立稳脚跟。当时中原的形势是石勒的兵锋虽然摧毁了西晋王朝在这

一地区的地方政权，但并不能消灭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即各式各样的坞堡组织。石勒直接控制的只限于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中心的河北地区，而河南地区实际上仍控制在这些坞堡主手中。这些坞堡主有的附勒，有的附晋，有的动摇于二者之间，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因此，与石勒争夺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是争夺这批坞堡主。对此，祖逖是有所认识的。他在向司马睿“进说”中提到的“郡国豪杰”就是指的这批人物。但他以为只要北伐之师一旦到达，这些人就会“因风向赴”，这种估计看来是过于乐观了。

此时屯据豫州重镇谯城的是流人坞主张平和樊雅。张平本为“兖豫豪右”^⑩，曾起兵援救过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演（刘琨兄子，其官号为刘琨所署），演署平为豫州刺史，署樊雅为谯郡太守^⑪，各据一城，拥众数千。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各拥众数百，皆统属平。后司马睿又派其参军桓宣利用同乡关系说服平、雅受其节度，并加四品将军，使杆御北方^⑫。《晋书》卷八一《桓宣传》称：“（建兴四年）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遣参军殷父诣平、雅。父意轻平，视其屋，云当作马厩，见大镬，欲铸作铁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镬，天下定后方当用之，奈何打破！’父曰：‘卿能保头不？而惜大镬邪！’平大怒，于坐斩父，阻兵固守。”这里把张平斩殷父和阻兵说成完全是由于殷父轻侮张平所造成的恶果。我们认为这最多只能算作导致张平阻兵事件的导火线，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位手握重兵的四品将军不甘放弃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去受祖逖的节度。在这种情况下，祖逖只好兴兵致讨，但岁余不下，后诱谢浮杀平，遂进据太丘（今河南永城县西北）。但樊雅犹据谯城对抗，张平余众亦助雅攻逖。逖于是向南中郎将王含、蓬陂（在河南开封市西）主陈川求援，王、陈分别遣桓宣（此时已为王含参军）、李头率兵助逖进讨樊雅。逖遣桓宣说降樊雅，遂进据谯城。不久，石勒遣石虎围谯，王含复遣桓宣援救，宣未至而虎退，逖乃留宣共讨诸屯坞未附者。按《通鉴》卷九十，此时已是建武元年（317）六月。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祖逖终于解决了实力雄厚的拦路虎张平和樊雅，占据了谯城，立稳了脚跟，从而打开了北伐的新局面。

第三步，反复争夺，控制整个河南地区。在与樊雅的作战中，李头援逖有功，逖遇之甚厚，头每欢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陈川怒而杀李头，李头亲党冯宠率其所属四百余人归逖。川益怒，遣众掠豫州诸郡，逖击破之。太兴二年（319）四月，川以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叛降石勒。考陈川本为并州乞活陈午从父，午自永嘉末即据浚仪蓬陂为坞主，自号陈留内史；午卒，川又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这股并州流民集团屯据浚仪达八年之久，中途又曾反复于晋、勒之间^⑬。据此可知陈川之降勒恐非个人意气所能解释，主要原因当是畏惧祖逖动摇其军心，吞并其部众。《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称陈川降勒后：“逖率众伐川，石季龙（即石虎）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同书卷六《元帝纪》则称：“（太兴二年五月）平北将军（按当作平西）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同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亦称：“平西将军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季龙救川，逖退屯梁国，季龙使扬武（将军）左伏肃攻之。……桃豹至蓬关，祖逖退如淮南。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通鉴》卷九一采用《本纪》与《载记》之说，称：“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勒遣石虎将兵五万救之，战于浚仪，逖兵败，退屯梁国。勒又遣桃豹将兵至蓬关，逖退屯淮南。……”然而罗振玉氏《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却又与《晋书》本传略同，其文曰：“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先弛^⑭，逖设伏射杀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同一件事，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究竟哪种说法较近于历史的真实呢？我们认为还是《载记》所说比较

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第一，如果石虎的援军一开始就被祖逖杀得大败，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掠豫州诸郡”和留桃豹守陈川故城呢？第二，石虎领兵五万，加上陈川的五千，共有五万五千人，而祖逖兵众充其量不过万人而已（淮阴招募的二千加上合并张平、樊雅数千兵众），在这样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祖逖暂作撤退是合乎情理的。第三，《载记》对此事记载最为详细。但它并未说祖逖兵败或战败，只说“退屯梁国”和“退如淮南”，故《本纪》云“王师败绩”也不够准确，因为撤退与战败并不等同。第四，本传所云之“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可能与写本晋史所云之祖逖设伏射煞左伏肃就是一回事，然而本传将这一小小的得手过于夸大了，从而失去其真实性。总之，由于陈川的投敌和石虎的南侵，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祖逖曾暂作撤退，于太兴二年五月退屯淮南（今安徽寿县）。但同年十月，祖逖即遣督护陈超进击桃豹^⑩。陈超兵败牺牲，又复遣部将韩潜与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蓬陂坞，潜居东台，豹居西台，相持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盛米状，使人运往东台，又令人担米，故意让敌缴获，敌久饥，以为逖军粮充足，十为丧气。同时，逖又遣韩潜、冯铁追击石勒派来的运粮队于汴水（故道在今河南东部，由黄河东南流，过开封市东南流入淮水），尽获之，豹乃退据东燕城（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古黄河南岸）。太兴三年六月，逖使韩潜进屯封丘（今河南开封市北封丘县）、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今河南杞县）。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争夺，祖逖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又多次遣军要截石勒，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境土日益缩小。七月，勒复遣精兵万人距逖，又为逖所破，朝廷以功加逖镇西将军。先是河南境内诸坞堡主如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⑪，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皆受逖节度。“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⑫。

第四步，练兵积谷，准备北渡黄河。控制河南并非祖逖北伐的最终目标，他的最终目标是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因此，他控制河南后，不敢稍有懈怠，抓紧时间“练兵积谷”^⑬，为北渡黄河作好充分准备。在此期间，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还注意与石勒维持一种“睦邻”关系，如遣参军王愉出使石勒（勒亦遣左常侍董树报聘）^⑭，应石勒之求听开“互市”，从中“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而对“河上堡固先有任子（按即人质）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但不幸的是朝廷对祖逖的北伐一贯持不支持态度。正当祖逖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之际，太兴四年（321）七月，朝廷派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逖以渊虽名气颇大，然无弘致远识，而自己历尽艰辛收复河南，现在反位居其下，心中甚是不服^⑮。特别是此时大军阀王敦与朝廷矛盾日益尖锐，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遂忧愤成疾。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下去。《晋书》本传称：“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按虎牢关，唐人避讳改虎为武，其地在今河南巩县西），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逖恐南无坚垒，必为贼所袭，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闾率众筑垒，未成而逖病甚。……（乃曰）‘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俄卒于雍丘，时（太兴四年九月）年五十六……册赠车骑将军。”随着祖逖的逝世，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从此中断。十月，朝廷以其弟约代领其众，而约无绥御之才，不为士卒所附。永昌元年（322）祖约退屯寿春，祖逖北伐所获之成果逐渐丧失殆尽。

（三）

祖逖北伐正值东晋政权创建阶段，此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后赵石勒的南侵。祖逖北伐的成功不但遏制了石勒的南下，而且将其势力逐出黄河以南，从而扩大了东晋的疆域，巩固了

东晋的边防。与此同时，权臣王敦久怀逆乱之心，亦因慑于祖逖的实力和威望才迟迟不敢发难；而祖逖的实力和威望又正是北伐带来的成果。以上说明，祖逖北伐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而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巩固、稳定的东晋政权的存在，对于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南侵，使东南广大人民免受野蛮蹂躏，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使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是何等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祖逖北伐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如前所述，在西晋末年大动乱的历史转折关头，门阀士族营垒中有一部分人振奋起来，走上了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战斗的前线，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祖逖就是这部分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即使同与他齐名的刘琨相比，无论从建树的功业还是从政治谋略、军事才能以及个人品德等方面看，祖逖都是要略胜一筹的。

首先从政治上看，史称“刘琨善能招延而拙手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又称“琨为并州牧，纠合齐盟，驱率戎旅，而内不抚其民，遂至丧军失士，无成功也”^②。古人把这归结为刘琨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确有见地的。与刘琨相比，祖逖则不但善于招怀军民，而且尤其长于御军抚民。他在自洛阳流徙至淮泗的途中就能体恤和帮助“同行疾老”，从而深得众人的拥戴。在北伐过程中，他更是注意“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夺回陈川所掠豫州诸郡之“子女车马”，“皆令归本，军无私焉。”“侯骑常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逖御军，肃而有恩，“其有微功，赏不逾日”。故本传又称：“百姓感悦，当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午。”其得人心如此。……（及卒）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太平御览》卷三三六引袁宏《祖逖碑》曰：“逖为豫州刺史，薨时君愆未旋，群寇围城，冲櫓既附，城将降矣。勇士五百，抚戈同泣：‘非祖侯之为，吾其谁为死！’并力齐赴，卷帛宵起，遂陷坚阵，负戈而反。”以上说明由于祖逖长于御军抚民，能深得军心民心，故耆老有“慈父”之咏，勇士作殊死之斗，而这正是祖逖北伐成功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军事上看，刘琨由于不善于御军抚民，很难深得军心民心，故在严酷的战斗中实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反过来又逼得他在军事上不得不走上单纯依靠外援和贪图“侥幸万一”的歧途，以致最后落得失地丧命的可悲结局^③。而祖逖由于长于御军抚民，深得军心民心，故在严酷的战斗中，虽不是一帆风顺，但其实力仍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祖逖也积极争取外援，但并不依赖外援，更不图侥幸取胜。对林立于河南境内的坞堡，他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对顽抗者给予军事上的打击；对互相攻击者则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解之，从而使其受已节度；最后还采取灵活的态度，允许河上有人质在后赵的坞堡主“两属”，从而获得其暗中支持。

最后，从个人品德上看，史称刘琨“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心胸又窄狭，不能容胜己者，如宠信佞人徐润，枉杀亢直的令狐盛。故其母亦曰：“汝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济？如是，祸必及我。”^④这些乍看似只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很难做到抚军恤民，从而深得军心民心。与刘琨相比，史称祖逖“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事实证明、具备这种品德的人，就比较容易做到“爱人下士”，从而深得军心民心。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祖逖都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名将。

注释:

① 见《晋书》卷六二《祖逖传》。后文凡引本传,不再加注。又《世说新语》上卷,《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称范阳祖氏“九世孝廉”。

② 《太平御览》卷四七六,引《晋纪》称祖逖“梗概有大志”。

③ 《太平御览》卷五一六,引王隐《晋书》曰:“祖逖与弟约将母诣洛,交结人流。逖舅程元良,良弟卫,弟收,并台郎州都(按台郎即尚书郎,州都即州的大中正),有势街洛。更共扶赞两甥,故并升清途”。

④ 本传不书年月,据《晋书》卷四《惠帝纪》、《通鉴》卷八四,齐王冏为大司马,长沙王乂为骠骑将军俱在永宁元年。

⑤ 《北堂书钞》卷六九引《晋中兴书·范阳祖录》曰:“祖逖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智出人表”。据此,则祖逖已就任越典兵参军。

⑥ “行主”为流民集团在迁徙过程中推举出的首领。

⑦ 祖逖至泗口及被征为军諮祭酒的时间,本传与本纪均无记载。《通鉴》卷八八将此事置于建兴元年八月条下,然显系追述之文,因为此时逖业已渡江兆伐进屯淮阴了。但《通鉴》称“左丞相睿以(逖)为军諮祭酒”,考睿为左丞相事在建兴元年五月。据此可知祖逖达泗口当在建兴元年五月之前,被征为军諮祭酒当在建兴元年五月或稍后。

⑧ 司马睿自永嘉元年用王导计镇建邺以来,一心只顾在孙吴旧壤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根本不想北伐。如永嘉四年怀帝遣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睿不作任如响应。(见《晋书》卷五《怀帝纪》)又如愍帝建兴元年七月遣使者刘蜀诏睿进军中原,八月,蜀至建康,“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加以拒绝,(泽《通鉴》卷八八)所谓“方拓定江南”,就是《元帝纪》所称的“遣诸将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按弼为孙皓族人,与周繇,徐馥起兵反睿)于宣城,平社毁于湘州”。建兴四年、长安不守,睿虽“出师露次”,作出一付“刻日北征”的架势,但旋即以“漕运稍期”为借口取消了这次行动,并将督运令史淳于伯斩首以塞责。是以《通鉴》直书“睿素无北伐之志”。

⑨ 本传无“前锋都督”四字,今据《太平御览》卷四八〇引《晋中兴书》加上。

⑩ 见《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

⑪ 《祖逖传》称平、雅官号为刘演所署,《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则称“自称”和“自号”。

⑫ 详见《桓宣传》。宣为谯国谯人,平、雅与之同州里。

⑬ 详见《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关于乞活陈午、陈川的情况,周一良先生在《乞活考》一文中论述甚详,兹不赘述。

⑭ “逖人”二字不好解释,疑有脱误。“左伏肃”系石勒部将。

⑮ 详见《晋书》卷六《元帝纪》。

⑯ 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矩被乡人推为坞主,东屯荣阳。元帝除为都督河南三郡军事。荣阳太守。郭默,河内怀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后投李矩,太兴初年除为颍川太守。赵固原为刘聪部将,后率千骑降李矩,矩令守洛阳。(以上详《晋书》卷六三各人本传)上官已原为长沙王父故将,永嘉之乱后为坞主,事迹不详。

⑰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又称:“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悼之,不敢为寇……祖逖卒,勒始侵寇边戍。”

⑱ 见《通鉴》卷九一。

⑲ 《晋书》本传称勒“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通鉴》亦采此说。然《石勒载记》下却详细记述了双方互遣使节的情况。今采《载记》之说。

⑳ 按祖逖为镇西将军,戴渊为征西将军,就军号而论,征高于镇。又戴渊都督六州诸军事,其中包括豫州,故祖逖为其所统。

㉑ 见《世说新语》下卷《尤悔篇》及注引邓粲《晋纪》。

㉒、㉓ 见《晋书》卷六二《刘琨传》。